**漫谈浙中地方史料中的疫病与防治**

**----以金华部分县志为例**

浙江师大附中 吕准能

刊载于江苏文艺出版社20年7月的《龙山文苑》第二期

翻开尘封千百年的史册,从最早的殷墟甲骨文对疾病疫情的记录起，已有了“虫”、“蛊”、“疟疾”等文字，后在《尚书》、《山海经》中多次出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曰：“疫者，民皆病也。”疫病指由细菌、病毒等强烈致病性微生物感染人体而引发的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由于疫病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给人类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恐惧。一部抗击疫病的历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在我国先民有过无数的与疫病较量的经历并留下大量的历史记载。让我们通过了解人类与瘟疫博弈的非凡进程，值得我们足够的考量和珍惜，从而见微知著，以史为鉴，为我们战胜瘟疫大有裨益。

**古代我国的重大疫情**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断言“瘟疫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疫字最早出现在先秦的《周礼》中：“遂令始难欧疫”，那时已意识到疫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传染性疾病。《吕氏春秋》中“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疠疫”这句表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已对瘟疫有了初步的认识。近年来虽然随着社会生活史研究热的的兴起，衣食住行已越来越受到了各界的瞩目，但直接关乎生老病死的疾病医疗，仍基本处于历史学的“冷门”。实际上，只要稍作梳理便不难发现，疫病与医疗对人类有着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大范围瘟疫次数（不完全统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期** | 周 | 秦汉 | 魏晋 | 南北朝 | 隋唐五代 | 宋元 | 明 | 清 |
| 次数 | 1 | 13 | 11 | 17 | 17 | 52 | 64 | 74 |

后世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传染病；天花、霍乱、鼠疫等，到了汉代起才传入，此后，我国才步入了一个瘟疫越来越频繁的快速扩散期。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一文指出，3000多年大疫史上有两个活跃期（2—3世纪、16—19世纪），且有愈后愈多之势；东部多，西部少。

据考究两汉疫情较为严重的疫病流行次数为50次，其中西汉（含新朝）17次，东汉33次，汉代平均约8.52年发生1次疫情。史载东汉末年的几十年间，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多次。瘟疫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令人心悸。下面不是诗人的想象而是当时社会的写照，曹操的《蒿里行》有“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凄凉。到了赤壁之战第二年的公元209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样记载：“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这些这次瘟疫横行的惨痛经历者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叹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在曹植记载的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又一次大瘟疫中，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四人全因感染瘟疫而亡故。同年曹丕给王朗写信谈了感受：“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已身居皇位的曹丕尚且如此悲戚，更何况是在底层挣扎的平头百姓。

魏晋南北朝依然是瘟疫的高发期，362年中至少有76年发生过疫灾，平均4.76年发生1次疫灾，疫灾频度为21%，不仅高于其前的先秦两汉，而且高于其后的隋唐五代。而元代的1344年鼠疫笼罩淮河两岸，当时朱元璋的故乡安徽濠州祸不单行，先是发生旱灾随后又爆发了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时间内，朱元璋的父亲、大哥和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相依为命，无奈之下16岁的朱元璋被迫出家当了和尚，并处流浪乞讨。

明清时代多数省份五分之一的年数都有瘟疫的记录，根据最新研究，明代瘟疫大小共计330次左右，据《明英宗实录》记载“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口。”明朝末年风不调雨不顺，险象环生，不仅连年干旱，华北又发生了大鼠疫，不少人认为它是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更有学者曾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说辞，虽也许夸大其词，但至少说明了明朝灭亡和鼠疫大有瓜葛。

在明清交替之际瘟疫大规模传染的阴影下，1661年年仅23岁的顺治帝就由于感染天花去世。出于对天花的恐惧，孝庄皇太后最终选择了已出过天花、却幸运大难不死的顺治帝第三子年仅8岁的玄烨继承帝位便是康熙帝。在经历了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乱、饥荒与瘟疫的摧残后，中国人口也从明末约1.6亿人出现断崖式骤降。

**浙中县志中的古代疫病记载举例**

《黄帝内经》里载反复提及了我国南方的一种传染病——瘴气：“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其民嗜酸而食胕（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司马迁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元代医生曾世荣认为“北人水气多，南人瘟疫盛，地气天时使之然也”。如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南方暖湿，有很多的蚊子、钉螺等带来疟疾、血吸虫病等，确实有些道理。以金华为中心的各市县作为典型的江南区域，地处浙中金衡盆地的东片，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唐宋以来人口剧增，此处的手工业和民间商业颇有底蕴，东阳为“建筑之乡”，永康为“五金之乡”，义乌“货郎担”等都远近闻名，因独特的交通、人文和工商等因素，导致宋代以来后来居上，固然人口流动也日益频繁，不过更多的疫病也相伴而生。

翻开尘封千百年的史册，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人类最古老而可怕的祸患，致命的瘟疫犹如孽种时常在吞噬着人类，并引起整个人类社会的恐慌和混乱。譬如来自张丽芬的《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考证：山西一地在明代276年间曾37次出现灾疫，且多在成化十八年（1482）之后，尤以万历、崇祯两朝为甚。疫灾常常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相随，尤与饥荒并发的频率最高，疮痍满目，疫疠丛生。

我国拥有相当完整的历史记录，当中有大量灾疫片段，连家谱和县志中也充斥可怕的疫病于字里行间。笔者查询了金华所属的多部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县志，包括：1.《金华市志》，1992年3月版；2.《永康县志》，1991.3；3.《金华县志》，1992.8；4.《义乌县志》，1987.9；5.《武义县志》，1990.3；6.《磐安县志》，1993.12；7.《兰溪县志》，1988.11等。

（1）《金华市志》P1048：建国前，鼠疫、霍乱均有发生，天花、麻疹、白喉、流行性脑膜炎（流脑）、百日咳、疟疾、痢疾、伤寒蔓延，骨质灰质炎（骨灰），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狂大病等屡见不鲜。康熙四十四年（1704）、嘉庆七年（1802），道光十四年（1834）、同治二年（1863），浦江发生几次大疫，人口骤减。

（2）《武义县志》P11：明万历十五至十七年（1587~1589年），连年旱灾，疫病流行，死者甚众。P13：道光十八年（1838年），虫害禾稼，疫痢流行，饿死和病死多人。

（3）《义乌县志》P547：本县天花流行最早记载见于元代名医朱丹溪《格致余论》：“至正甲申（1344）春……邑间痘疮不越一家，幼童死者百余。”

（4）《磐安县志》P2：唐贞元六年（790），大旱，井泉凅，又瘟疫流行，死者甚众。开成六年（840），六月蝗灾。

（5）《兰溪县志》P2：明弘治九年（1496），夏，大雨弥旬。六月十五夜，三峰、砚坦两源山洪暴发，死者以百计。P3：明万历二年（1574），三月，大雨，暴雨撤屋拔木，横山乡和紫岩乡受灾尤剧，死30余人。明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至六月大雨十余日，溪中水涨丈余，居民皆乘屋泛舟，溺者甚众。水退疫发，民多死亡。明万历十六年（1588），大水入城，田禾尽没，民食草木，疫疠大作，死者无数。后大旱，民多流亡。P4：清道光十四年（1834），春，大疫，民多死亡。夏，有虫害稼，饥。是年冬粮价每斤百文。

**近现代疫病的部分记载**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国破民穷。大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致使数百万人罹难。咸同之际江南大疫各年波及县数表：注：源自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份 | 咸丰十年 | 咸丰十一年 | 同治元年 | 同治二年 | 同治三年 |
| 县数 | 5 | 3 | 24 | 17 | 9 |

地处浙中的金华八婺大地屡经劫难，尤其是抗战时期日本在侵华期间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实施细菌战，金华、衢州和宁波等地是日寇细菌战的重灾区，惨不忍睹，人们谈之色变。

（1）《金华市志》P1048：民国28年（1939年），金华县安地，虹路、临江、郑岗山一带发生疟疾、痢疾、麻疹，天花。29年3月，金华城内霍乱流行。据（东南日报）载，大史第、东市街有人上吐下泻，数小时即告无救，塔下寺、清波门一带亦有人死亡，酒坊卷5日内死亡9人。11月27日、28日，日本侵略军在金华屡次空投鼠疫杆菌。30年7月，中央卫生署在金华设置灭虱防疥站。32年，日军荣字1644细菌部队用飞机在金华、兰溪等地空投赤痢、伤寒等细菌，造成大批军民伤亡。34年，永康疟疾暴发流行，高峰期间，枫林村每天死亡4人。

（2）《武义县志》P19：民国33年（1944年）春，流行性脑脊髓炎流传全县，死2400多人。

（3）《兰溪县志》P10：民国31年（1942），八月，日军一一六四细菌部队，将霍乱、赤疠、伤寒等等细菌用飞机空投兰溪，致军民染疾而死伤者多。民国32年（1943），8～11月，恶性疟疾流行，患者无数。民国35年（1946），县城出现霍乱。民国36年（1947），11月，城南流行性腺鼠疫，患者47人，死21人。

（4）《磐安县志》P11：清道光十四年（1834），四月，瘟疫爆发，延至冬，病毙者十之三四。同治二年（1863），春大饥，米价猛涨，肉每斤四百文，又瘟疫蔓延。P13：民国7年（1918），6月，瘟疫大发，死亡甚众。P15：民国21年（1932），麻疹流行，童稚多夭亡。P15：民国30年（1941），天花流行，全县病千余人，死者甚众。

（5）《金华县志》P19：民国28年（1939），安地乡疟疾、疾、麻疹、天花等症流行。29年8月，金华霍乱流行甚速，五日之内，死亡29人。31年8月，日军细菌战部队又一次用飞机将赤痢、伤寒等细菌空投于金华、汤溪等地，致使大批军民死亡。31～34年金华，汤溪县疟疾、痢疾、流脑等传染病流行，死亡近万人。25～37年，金华境内的流脑大流行4次，麻疹大流行2次，痢疾大流行3次。截止解放初，县内发生和流行过多种传染病。

（6）《永康县志》P635～636：旧社会传染病猖獗，称之为“发瘟病”。清同治二年（1863）、夏秋疫，染者多死。民国6年发瘟病，下里溪村死亡70余人。姓傅村傅金福一家7天死5人。29年天花、脑膜炎流行，病死者颇多。31年花街、杨坑一带麻疹流行，死亡36人。34年荆州、后吴一带疫，死亡百人，同年疟疾暴发性流行，在高峰期枫林村每天死4人。36年赤痢、疟疾、天花、霍乱等仍有流行。1950年象湖里村天花流行，死亡20人。1953年的瘟疫发病率仍高达78.41/10万。

（7）《义乌县志》P5：清同治二年五六月间疫病流行，死者甚众。P11：是年（1941），鼠疫在县境流行，铁路工人郦冠明9月2日在衢县感染鼠疫，5日乘车回稠城镇北门街，于次日死亡。9～12月，仅农协村鼠疫患者即达83人，死亡7 1人。此疫在全县延续达4年之久，至1944年5月方绝迹。延及今江湾、苏溪、廿三里、平畴、杨村、徐村、桥东、后宅、东河等乡，发病人数689人，死632人。P547：（鼠疫）1942年11月16日，日军包围江湾崇山村，用火焚法制止鼠疫蔓延，烧死病人9名，烧毁房星400余间。（天花）民国期间流行从未间断，1941年春，义北潘村，岭口（现塘李乡）一带大流行，潘村全村约200人、得天花者达50余人。其中刘樟华一家13人，有9人得病，死亡2人。（霍乱）1946年，全县发病37人，死亡7人。P548：（麻疹）本县流行历史悠久，范围极广，且死亡率高。1946年东河乡五星塘村98名儿童患病，死亡37人，死亡率37.7‰。

（8）《武义县志》P641：民国15年秋，宣平县山坑口村天花流行，染病70余人，存活14人。民国20年春，嬴头、大应等村30余人死于流行性脑脊髓炎。民国27年，从沦陷区流入难民多人，住程王处祠堂和镇庙等处，天花、痢疾等传染病流行。民国28年7月，岭下汤痢疾蔓延，死50人。

此外，笔者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8 年第 11期发表的《精选史料 学会实证 优化教学——金华抗战史料运用漫谈》中提及：“王悦姣控诉了家乡婺城区汤溪在三年中300多户人家约1/3家庭受细菌战毒害，死亡了108人。来自义乌的罗晨斌同学揭露了1942年9月崇山村出现鼠疫患者并死亡起，该村405人死亡的惨祸。”

**疫病防治的进步**

人类总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但是当一次又一次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疫病向人类侵袭时，人类又常常惊慌失措。鉴于此，人类与疾病抗争从人类诞生的那时起，就如影随形般难以消停，但人类从来也没有因为疫病停下前行的脚步，而是群策群力阻止疫病的扩散，尽力消除疫病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先秦时期留下不多的文献典籍中，已可看到先民们对“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总结，湖北出土的《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民间在端午节，有将混合有雄黄酒的石灰水洒于房屋角落的习俗。西汉晚期政府在蝗灾旱灾之后,对疫病患者隔离。南齐时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隋唐时有“病坊”,一些寺院也收治病人。

依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考证：等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摘编自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指出：“在疫病流行时期，军营将士会食用特定草药预防疫病，并将染病患者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地方官府常常采取施医送药的救疗手段，扩大救疗面。……一些深怀济世思想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深受儒家爱民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也主动出资出力，救助于民。”金华各地也同样有所作为，有以下列记载为证。

（1）《兰溪县志》P599：宋代曾设惠民局，储药饵以施济贫困百姓。明、清两代有训科管理民间医药。P609～610：建国前疾病流行，鼠疫、霍乱均曾发生，天花、伤寒、痢疾、血吸虫病、疟疾，麻疹、流行性脑膜炎、白喉、百日咳、脊髓灰质炎、乙型脑炎等急染病及头廯、麻风和性病亦屡见不鲜。鼠疫：民国36年（1947）自外地传入，发生于城关镇自由路、塔山、保安埠一带，自11月3日至12月8日，历时36天，患者47人，其中死亡21人。经临时隔离病院治疗者34人。省医防第二队于11月17日，中央卫生署检疫站和第六医防队于12月13日到兰溪，协助开展防治工作。

1. 《永康县志》P3：明洪武二年（1369），知县吴安国设置惠民药局，以医生领之；P4：明洪武十七年（1384），开设医学，惠民药局隶属之。P635～636：建国以来，查明县内较流行的传染病计21种，经预防接种，积极治控制传染源等措施。1950年，消灭了霍乱。此后，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炭疽、伤寒、副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钉螺旋体等传染病先后得到有效控制。……近年来又接种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联苗82万人次……。

（3）《金华县志》P4：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将军路建药王庙；宣统二年（1910），金华福音医院建成开业。民国29年11.27～28日，日军飞机在金华上空喷撒鼠疫杆菌，至年底死亡人数达160余人。P641：民国30年（1941），始成立县防疫委员会，时以鼠疫防疫为主。

（4）《义乌县志》P3：明洪武元年（1368），知县张永诚遵制于县署西建养济院。P539：明宣德三年（1428），令天下军民贫病者，惠民药局给与医药。P546：民国30年（1941），始成立县防疫委员会，12月改称县临时防疫处，有员工60名，主要承担承担鼠疫防治任务，日本侵陷后停顿。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312医疗队长刘宗歆在本县感染肺鼠疫，以身殉职。P547：为制止疫势蔓延扩散，浙江省卫生处防疫队，军政部防疫处等单位会同县防疫处，曾采取封锁疫点、管制交通、禁止来往车船停靠、设置隔病房及留验所、指定染疫死亡者掩埋地点、注射鼠疫预防针等措施。

（5）《武义县志》P641：民国20年，宣平医院始种流脑疫苗。民国29年后，霍乱、伤寒、鼠疫和霍乱伤寒混合疫苗陆续应用于预防。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人类的医疗卫生事业突飞猛进，尤其是我国70年来防疫事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金华县志》第641页为例：解放初，县卫生院内设卫生防疫科，配有专职人员。1953年成立市卫生防疫站，金华和汤溪县先后成立县卫生防疫站。……1961年，区、乡、街道配备专职卫生防疫人员89人，加上厂矿学校医务人员和乡村医生，形成卫生防疫网络。……1981年改名金华市卫生防疫站。

汉末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开明宗义：“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除了类似张仲景这样的大医们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不能忽略普通官民特别是大批无名医生的付出。我国古代圣贤有志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然而，受到科举功名的诱惑，致使良医相对稀少，从金华的部分县志也可见端倪：

1.《金华市志》P1128：朱丹溪（1281～1358）原名震享……。元义乌人。因居所临丹溪，……后人习称朱丹溪。……因母病脾而习医，两应乡试未中举，40岁后乃专心学医。曾离乡到江、浙各地访问名师，最后求教于杭州名医罗知悌。……悉心传授他继承罗氏学说并博览群书，辩析得失，阐发“相火”和“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理论，创立著名的滋阴学说，成为中医学上养阴派代表人物。行医寒热虚实辩证施治，对症下药，屡见神效，与刘完素，张从正，李果，被后人尊为金元四大医家。……震亨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凡有求医，立即前往，雨雪天，百里外，也不拒绝。闻有贫困无告者患病，不请自去，且乐于施赠药品。……著有《宋论》、《格致余论》、《伤寒论辨》……等。

2.《金华市志》P1146：何葆仁（1871～1948）字静斋。武义人，16岁中秀才，20岁为拔贡，30岁起行医。民国初年从南湖迁居县城石板巷。为人治病，诊断仔细，用药恰当，治病又治心，疗效显著。诊病处方不计金，对贫困者乐助药费。医名日振，旧处州、金华、衢州三府属县，亦时有病人幕名远道求诊。民国31年（1942），日军侵占县城，避居平塔小山村，每采草药为农民治病。……另有《医案手稿》12册，记述心得及验方……

3.《永康县志》P721：应韶，字思敬，元末明初芝英人。善岐扁之术，为人治病不问贫富，不择寒暑早夜，不避疫疠，不俟仆马。有人请诊就携带良药前往。医术精良，人称其有手到病除之功，并给他取了一个堂号，谓之“济生”。子应胜（号行素），孙天瑞，皆以儒医鸣于世。

另外，当代兰溪籍的陈薇少将在近年来的抗“疫”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可谓家喻户晓。

**回望与反思**

贾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感慨：“整个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这并非危言耸听，人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人类与病魔的较量中，铭记着人类公共卫生事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我国祖先对瘟疫主要采取了药物治疗、免疫疗法、隔离传染源等对策，如我国端午节有配香囊、喝雄黄酒等习俗。据《中国疫病史鉴》显示，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我国先后发生过三百多次瘟疫，但借助中医的治疗，最大限度控制了疫情的恶化。初步统计从1408到1643年的200多年间发生了大瘟疫共19次，仅相当于汉献帝一朝的数量，这足以凸显了张仲景、李时珍等历代医学成果的恩惠。2015年12月应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发表了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的主题演讲，向世界十次提到了“中医药”。总之，人类与病毒的赛跑永不会终结。**同心战“疫”，全力以赴，**决不能掉以轻心。其实，传染病疫情远未消失，提前防范，积极应对，采用中西医结合，正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好的启迪。